

21 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转型

张明军¹

I. 21 世纪前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简略回顾

当代中国政治学起步于 1949 年, 1952 年中国高校和科研单位院系大调整, 取消了政治学系, 政治学研究被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替代。1964 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恢复政治学系, 但此时的政治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探讨。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 政治学研究再度中断。1979 年 3 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 “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及世界政治的研究, 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 现在也需要赶紧补课”²。从此揭开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时代。经过改革开放的洗涤, 中国政治学在研究内容取得较为丰硕成果的同时, 研究方法也呈现了由过去单一的阶级分析方法转化为多元研究方法。但在 21 世纪前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类型六种方法。

1. 规范研究:

一是阶级分析方法。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冲突和阶级革命学说为指导, 分析和探索现实中的政治问题, 这部分研究学者主要集中于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其代表作是华东师范大学王松教授主编的《政治学基础理论》³, 该书以阶级的产生为逻辑起点, 分析了国家革命、政权与政治主体和行为演进及发展的原理。

二是思辨研究。从对基本价值的思辨性分析中演绎出政治学说, 并以此解释政治现象。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泽厚教授、天

津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徐大同教授。其代表作是李泽厚教授所著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论》⁴, 该书以政治领袖和精英人物的思想文化为主线, 研究探讨了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所产生的各种政治现象。

三是经验研究。从前人经验分析中归纳出政治学说, 并以此解释政治现象。如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王浦劬教授、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朱光磊教授。其代表作是朱光磊教授主编的《大分化新组合——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⁵, 该书以政治社会学为基础, 探索分析了改革开放过程中, 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化、组合及其产生的原因。

四是比较研究。从同类政治对象的差异分析中提出政治学说, 并以此解释政治现象。如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曹沛霖教授、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谭君久教授。其代表作是曹沛霖教授翻译主编的《比较政治学: 体系、过程和政策》⁶, 该书通过对不同国家政治体系、过程 and 政策的比较, 在分析异同的基础上, 阐明了导致差异的原因。

2. 实证研究:

一是田野调查研究。从农村基层社会调查中获取的一手资料分析中概括出政治学说, 并以此解释政治现象。如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院的徐勇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的贺雪峰教授。其代表作是徐勇教授所著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⁷, 该书通过实地访谈, 介绍了中国农村村

民委员会选举的状况、问题及原因，并对农村自治的前景作了前瞻性的预测。

二是城市基层调查研究。从城市基层社区自治和人民代表选举调查中获得的一手材料中提炼出政治学说，并以此解释政治事件。如深圳大学的黄卫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史卫民研究员等。其代表作是史卫民研究员所著的《直接选举：制度与过程：县级人大代表选举实证研究》⁸，该书通过对多个案例的实证调查分析，总结了县级和区级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存在的问题和导致问题的原因。

上述六种研究方法基本上均属于定性研究方法。之所以这个时期主要运用的是质性研究方法，是因为当时中国主要解决的是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问题，即中国政治朝何种方向发展的价值取向问题。研究方法的选择受制于研究的政治问题，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问题，决定了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主要以质性研究为主。

II. 21 世纪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转型的轨迹

进入 21 世纪之后，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问题经过争鸣，基本形成共识，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围绕如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这一既定目标，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在实践中不断更新，主要表现为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开始减少、定量研究方法开始被部分青年学者运用并为中国政治学界所认同和接受。其演进的轨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 2002 年至 2007 年。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阶级分析方法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实证研究中的定量研究方法日益凸显。此时的定量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三农”问题的关注和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分析研究。其代表人物是南京大学的肖唐镖教授和中国香港浸会大学的陈峰教授。代表作主要是肖唐镖教授所著的《村治过程中的宗族——对赣、皖 10 个村治理状况的一项综合分

析》⁹、《乡镇长直选的民意基础——对村民自治的一项效应与后果的分析》¹⁰、《正式体制、工作现实与血缘亲情——地方干部对农村宗族的多元立场与态度分析》¹¹、《宗族、乡村权力与选举：对江西省十二个村委会选举的观察研究》¹²。上述文章和著作针对中国农村中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宗族对中国农村基层选举的影响、宗族与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关系、宗族对中国农村基层干部思想和行为的制约等复杂问题，运用较为简单的定量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得出了宗族问题是解决中国农村诸多现实问题的核心议题，推进和发展中国农村治理必需以解决宗族问题为逻辑起点，通过农村基层治理制度的完善和文化的渐步变迁，将宗族所内含的治理负效应转化为农村基层治理的正能量，才能不断实现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向现代文明迈进的结论。

第二阶段是从 2008 年至 2012 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中国进入人均 GDP3000 至 5000 美元的风险社会时期，社会基层矛盾特别是两极分化所导致社会冲突日益增多，同时城市社区自治和业主维权事件逐渐上升，为解决此类问题，政治社会学中的定量研究方法、博弈论研究方法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此时的定量研究主要集中于利益直接冲突型群体性事件、泄愤性社会群体性事件和地方官员的绩效与晋升的关系问题。其代表人物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的冯仕政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刘欣教授、中国香港中文大学的李连江教授、东北财政大学的刘德海教授。代表作是冯仕政教授所著的《重返阶级分析？——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范式的转换》¹³、《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阶级认同与社会稳定——基于中国综合调查的实证研究》¹⁴、《再分配体制的再生——杰村的制度变迁》¹⁵，刘欣教授所著的《中国城市的社会阶层与基层人大选举》¹⁶，刘德海教授所著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中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¹⁷、《群体性突发事件争夺优先权的演化情景分

析》¹⁸、《维权型群体性突发事件社团网络结构与策略的协同演化机制》¹⁹。上述文章的发表和著作的出版，对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由定性向定量的转型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冯仕政教授运用社会学的定量分析深入探讨了中国社会中阶级的分化和社会问题。刘德海教授运用博弈论的定量研究方法深刻阐释了多种突发事件的演化过程及其预防对策。

第三阶段是从 2012 年至 2017 年。随着中国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主张。政治学研究方法在原有方法的基础上,政治社会学的定量研究、田野调查分析方法向深度发展。比如华中师范大学的徐勇教授团队,在中国农村先后开展了百村土地经营承包现状大调研和东、西、南、北、中典型村庄土地制度变迁大调查。同时部分学者运用系统工程论、实验定量研究方法、混合研究方法对政治学的问题进行探讨。系统工程研究方法以清华大学的孟天广教授为代表,其特点是将定量研究中的因果关系研究转向因果机制研究。实验定量研究方法是以前南京大学的梁莹教授为代表,其特点是运用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等理论与政治学理论相结合,通过大量的人脑科学试验挖掘出产生某种政治行为的生理因素。混合研究方法主要以浙江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赵鼎新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的蔡永顺为代表,其特点是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分析政治现象和事件产生的深层因素。代表作之一是孟天广教授的《Conditional Receptivity to Citizen Participation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in China》²⁰,该文以系统工程研究方法对中国地方政府的回应性及其先决条件进行了研究,通过对中国 6 省 15 市 1377 位地方政府官员的调查实验,得出了政府对民意的采纳依赖于当地政府——社会关系质量的结论。代表作之二是梁莹教授《Emotion Dysregulation of Women with Premenstrual Syndrome》²¹,此文运用实验定量研究方法,考察了情绪调节策略使用频率与 PMS 严重程度

的相关关系,得出了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频率与 PMS 严重程度呈显著负相关,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频率则与之呈显著正相关的结论。这种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政治学的现象,不仅拓展了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同时对推进政治学研究内容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2001 年至 2017 年中国《政治学研究》所发文章研究方法示意图:

年度 研究方法	2001 年—2005 年	2012 年—2017 年
规范研究	93.2%	79.7%
实证研究	5.9%	19.8%
无法判定的研究	0.9%	0.5%

III. 关于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转型的评价

1. 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逐渐下降但在中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定性研究在 21 世纪前几乎在政治学研究中处于垄断地位。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政治学研究对象和研究群体代际、学习背景的变化,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但目前在中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以中国上海市为例,在对 11 所高校中 287 名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调查中发现:50 岁以上的学者 95% 以上继续运用定性研究方法,45 至 50 岁的学者 90% 左右运用定性研究方法,35 至 45 岁的学者 80% 左右运用定性研究方法,30 至 35 岁的学者 75% 左右运用定性研究方法。

2. 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逐渐上升,但在中国仍

然处于次要地位

随着中国政治学研究对象由政治价值取向向过程、手段和具体模式的转向,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日益提升。定量研究主要是被政治社会学或具有国外留学背景的学者所运用,在年龄上主要是 40 岁以下的青年学者运用,该群体在整个政治学研究群体中所占比重较少,定量研究在整个政治学研究中仍然处于次要地位。以中国北京市为例,在对 4 所 985 高校 160 位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调查中发现: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的 9 人,占比 5.6%,其中具有国外留学或进修经历的人占比 95.3%,40 岁以下的人占 96%。

3. 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质量不高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变量的选取缺乏科学依据。在定量研究自变量的选取中,缺少对所选取对象的深刻了解和本质分析,机械地运用定量研究的选择手段,导致自变量的选取往往是错误的现象。如中国省部级官员的晋升与 GDP 增长的关系研究。将正职省部级官员作为自变量,通过其晋升的数据建构与该官员所管辖区域 GDP 增长的模型关系,必然会得出与事实不符的结论。因为在中国官员的晋升中,市、县、乡级官员的晋升与该官员管辖区域的 GDP 增长具有正向相关关系。而正职省部级官员的晋升主要取决于官员对领袖的忠诚和上级对该官员的信任,一般与 GDP 是否增长没有相关性。二是定量研究水平较低。大部分学者能够发现自变量与结果的相应关系,但较少能够探寻出因果关系变量。目前中国学者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社会冲突与治理、基层选举等方面,在《中国行政管理》、《政治学研究》、《公共管理学报》随机抽取的 20 篇文章中,能够通过模型和分析,发现自变量与结果具有因果关系的只有 3 篇,所占比率为 15%,其余的 17 篇文章只证明了自变量与结果具有相关关系,未能分析和找出自变量中哪种变量与结果是因果关系。这种研

究成果反映了中国部分中青年学者在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质量不高,定量研究方法还处于起步和初级阶段,需要进一步的突破和提升。

4.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日益被学界认同

进入 21 世纪之后中国学术界经过长期的思考和现实经验的总结,深切地认识到了定性研究的优势在于能够根据经验和知识,迅速确定研究对象的性质和内在的因果关系。劣势在于缺乏足够的支撑所判断的结论。定量研究的优势在于能够以较多的数据和模型,反映和体现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联,劣势在于对特殊的政治现象和事件,难以确定正确的自变量,导致研究结论与现实的巨大差异。因此,中国学界更认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该方法将会成为未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方法。中国香港中文大学的李连江教授在其所著的《戏说统计》一书明确指出,作为政治学的研究者,关键是懂得统计和定量方法作为工具的运用,对于统计和定量研究方法的内在原理无需花费精力予以剖析和澄清。政治学研究者需要的是懂得怎样运用工具,而不是去研究工具。因此,采取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将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普遍认同的方法。混合研究方法的优势在于通过定性研究明确所研究政治行为和现象的性质及其内在原因,通过定量研究方法证明定性结果预判的正确性,两种研究方法相辅相成,使研究的结论更加准确,研究的质量更加提高。

5. 阶级分析方法的消失体现了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与时俱进

将阶级利益冲突和阶级斗争作为政治发展动力的阶级分析方法,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具有一定的价值。随着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逐渐缓和甚至趋于消失,阶级分析方法已难以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现象,取而

代之的是国际共识的现代政治学定量研究方法。反应了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演进是随着研究对象的变化而不断更新。4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不仅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研究内容的变化，而且引发了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转型。这种转型体现了中国政治学研究者逐渐摒弃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错误思想及其传统研究方法，进而融入世界主流政治学研究的趋势。将会通过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转型和发展，推动政治学研究成果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IV. 结论

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转型主要是如下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一是研究对象的变化。21世纪之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内容和对象主要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问题。该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了研究方法必然以定性研究为主要方法。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问题形成共识，中国政治学研究对象转为如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目标的路径和手段问题，新的研究对象必然要有定量研究方法的参与和运用。

二是研究者学习背景的变化。21世纪之前，中国政治学研究者大多是中国高校培养的学者，几乎没有学习过政治学的定量研究方法。21世纪之后，从美国、英国等国外留学归来的博士开始进入中国政治学的研究队伍。他们在国外所学习过的政治学定量研究方法也随着中国政治学的不断发展而被运用到研究之中。

三是研究者年龄结构的变化。21世纪之前的中国政治学者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大多在50-60岁左右。这类群体的研究者在长期的研究中已经形成了较为定型的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转型比较困难。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一批30至45岁左右青年学者加入中国政治学研究队伍，他们的精力和思维方式较为容易学习和运用政治学的定量研究方法。

四是研究者价值观念的变化。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政治学研究者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趋势。这种价值观念的变化反映在政治学研究过程中，不仅是政治学研究内容和对象的变化，而且体现在研究方法上是对定量研究方法的认可、学习和运用。

注释*

- ¹ 作者：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 ²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181。
- ³ 该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 ⁴ 该书由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
- ⁵ 该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 ⁶ 该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出版。
- ⁷ 该书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 ⁸ 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 ⁹ 该文发表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 ¹⁰ 该文发表在《中国农村观察》2003年第1期。
- ¹¹ 该文发表在《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3期。
- ¹² 该书由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 ¹³ 该文发表在《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4期。
- ¹⁴ 该文发表在《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 ¹⁵ 该书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年出版。
- ¹⁶ 该文发表在《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6期。
- ¹⁷ 该文发表在《中国管理科学》2010年第1期。
- ¹⁸ 该文发表在《公共管理学报》2011年第2期。
- ¹⁹ 该文发表在《中国管理科学》2012年第3期。
- ²⁰ 该文发表在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14年第12期。
- ²¹ 该文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DOI:10.1038)。